

我的青春岁月

○李树藩（1944 入学，政治）

李树藩，又名李忠，天津市人。1920 年 9 月出生。1943 年 9 月，靠自修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1944 年秋，升入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学习，1944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6 年 1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青年委员。后经王汉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初，在华北航空局和军委航空局的民航处任组长，参加了组建中国民航局的筹备工作。1950 年后，历任民航无线电总台台长、专家工作室主任、外事处处长、国际司司长兼党委书记、民航局发言人等职。1985 年 11 月，任中国民航总局国际事务顾问。1987 年 2 月，创办中国航空服务公司，担任董事长。1989 年 10 月离休。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任理事、常务副会长共六届，为校友热心服务 30 多年。

往事如烟，70 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来，却又历历在目。我今年已经 96 岁了，但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历，在西南联大和北大的学习与革命阶段，以及北平解放、迎接新中国到来前的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监视日寇战机

抗日战争时期，1939 年，云南省防空

司令部在云南南部中越边境设立防空情报电台 12 座，目的是监视日本战机从越南入侵我国进行空袭。19 岁的我被派驻云南南部玉溪元江县的防空情报电台，每天监视日军飞机的动态，发现敌情随时报告总台，以防日寇突袭。

声援学生运动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一个 20 多岁的穷学生，生活困难，没有经济来源，不得不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就在进步人士办的《观察报》当了一名记者。1944 年秋，经洪纪凯同学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后来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

1945 年秋，蒋介石夺取了龙云的军政大权，于是云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开始疯狂镇压学生运动。我所在的《观



2012 年 11 月 3 日，李树藩学长在西南联大建校 75 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

□ 人物剪影

察报》被查封，特务们按照黑名单抓人，一些进步人士被杀害。由于我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身份自然已暴露，我不得不想办法赶快离开昆明。

我想到解放区去，于是就找便车，搭车先去重庆。在到贵阳的途中，听说昆明发生了血案，我四处打听，又赶忙找到报纸，证实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的发生。原来，就在我离开昆明的第二天，11月25日晚，昆明几个大学的师生在西南联大召开反内战的时事讨论会，大约有6000余人参加，钱端升、费孝通等教授在会上演讲。这时，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了会场，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捣乱。次日，昆明30000名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军警破坏晚会的暴行，要求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的禁令，反对内战，呼吁美军撤离中国。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了我校同学李鲁连、潘琰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4人，60余名学生被打伤。全国各地学生举行抗议和示威游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国民党的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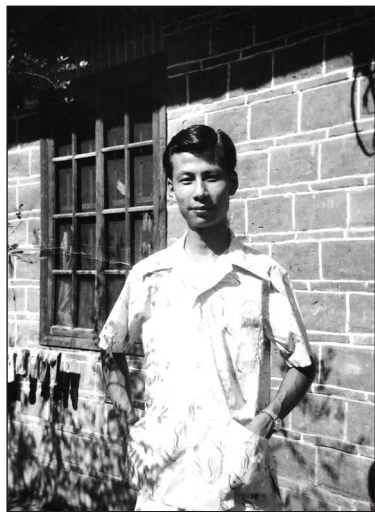
我到重庆后，找到刘光同志（中共中央青委），他说这里需要人开展工作，留下来吧，先不要去解放区。他要我找《新华日报》的记者朱语今同志联系。于是，我联系了联大的同学赵景伦、杨育文等去沙坪坝几个大学的学生组织串联，介绍“一二·一”惨案情况，声援昆明学运，并且联系一些进步人士和民盟（经罗子为、罗涵先介绍，我参加了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青年委员）、新华日报等单位，在沧白堂举行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隆重的

追悼大会。我们还去行政院找院长孙科要求严惩凶手，停止镇压学生运动，傅斯年出面接待了我们。

重庆进步人士在校场口开大会要求和平民主，国共团结，停止内战。郭沫若等许多进步人士刚到会场，一群特务就冲进来打砸会场，拉扯郭老和民主人士们。我见此状，知道大会开不成了，必须赶快通知未到会的单位和有关人士。我忙奔跑着去通知《民主报》《新华日报》、民盟总部等。正往前跑着，我看见一辆小吉普车开过来，正是周恩来同志，他坐在司机旁边。我立即招手示意他们停车，我告诉周恩来同志会场的混乱局面，叮嘱他们一定不能去会场了。周恩来听后点点头，忙叫司机调头，说他马上去找国民党代表团交涉，要他们停止破坏行为。

输送进步师生

1946年下半年，联大三校由昆明迁回平津，分别复校。西南联大的学生可以任



一九四八年的李树藩

选一校继续学习，我选择了北京大学。经王汉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我在中央航空公司当报务员（我在重庆时考入该公司，并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公司同意调我到北平工作），既作为职业掩护，也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爱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1948年8月17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下达了以“共匪嫌疑分子”的罪名在全国逮捕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

为了保存力量，减少牺牲，地下党决定组织部分党员和进步师生陆续转移到解放区。由于我的老家在天津，我在航空公司兼差也有方便条件，党组织交给我一部分转移力量的任务。

我的父亲是铁路工人，大弟弟树棋在菜站学徒。党支部研究决定，把我家作为一个地下联络点，有些经天津进入解放区的同学先到我家停留，由我大妹妹淑真帮



1948年底，李树藩和妻子诸有琼在北平东黄城根62号

着改制衣服，化装成老乡，再由父亲和弟弟趁天未亮时，从火车站后门把他们护送上车去冀东；还有一路是去西南郊，通过封锁线到冀中解放区。就这样从我家去解放区的有20多人。

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学校的教导主任王松声，是我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是我的人党监督人，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单线联系。清华大学有人能制作假身份证和假通行证，有同学要去解放区，我就找王松声，组织上同意之后，把要去解放区同学的假简历告诉他，然后取回逼真的假证件。吴晗教授的名字上了“剿总”的黑名单，李桦教授也不能在北平艺专待下去了，演剧队夏淳等一些同志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他们都希望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由我去通知他们什么时间、什么人去和他们接头，护送他们去解放区。我去清华大学执行任务，总是请诸有琼陪我一同骑自行车去。当时我们正在恋爱，表面看来，是一对情侣骑车去颐和园郊游，这是不容易引起人怀疑的。

我在航空公司兼差，给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当时我有较优厚的经济收入，有些同学去解放区或有任务从解放区来北平，我总是给他们几块银元作路费或零用；有些同学没有吃饭的钱，就来向我要。利用在航空公司工作之便，我可以为地下党传递各种信息，有些同志要到外地执行任务，我就替他们买飞机票，护送他们进出机场，躲避“航空检查所”的检查。

叶剑英交给我的艰巨任务

1949年初，中央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送

□ 人物剪影

来了国民党的和谈代表，飞机返回上海时，飞行报务员、通讯处长顾乐邨有要事需要留下来。可是飞机上没有通信联络是不能飞行的。组织上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让我利用这个机会，担任飞行报务员。起飞前一天，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同志带我到六国饭店见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指示我，到了上海要想方设法了解上海国民党空军的部署情况。

从刚刚解放的北平到尚未解放的上海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的飞行报务员的身份掩护我使危险降到了较低的限度。一下飞机，“航空检查所”就把我叫去仔细盘问，我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番，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公司飞行员招待所。当然我是不可能住在那里的，必须三天两头地更换住处。没过几天，就有同事告诉我，有人到飞行员招待所和我住过的地方去查询我的情况。就这样，我在上海住了20多天，一共换了十来个住处。

这次我担任飞行报务员，给地下党工作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我利用身份之便，把我军收集到的五六个大皮箱的“金圆券”带到南京，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我家是地下工作联络点

在北平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党的地下工作十分紧张，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活动地点。王汉斌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地下党学委派来领导我们支部工作的同志。我和他谈问题，汇报工作，经常都是等天黑后，到寒风凛冽的大街上边走边谈，工作起来非常不方便。1948年下半年，我通过熟人租到了东黄城根62号，

一个独门独院，和同事胡秀峻（地下党员）住的63号院隔墙有门相通。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联络点。客厅里摆着紫红丝绒沙发，屋角有一个高高的取暖的大煤炉，室温可达二十五六摄氏度。卧室里有大圆镜子的梳妆台，整个屋子显得有些富丽堂皇。其实，我们只买了一张没有挡头的简易弹簧床，此外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丝绒沙发是从信托商行廉价买来的外国使馆寄卖的旧货，其余的家具包括炊事用具，全是原来的房客——一个国民党空军大队长逃跑前折价卖给我们的。就是这些陈设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敌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主人竟会是共产党人。我和诸有琼准备提前结婚，成立一个家庭，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有了这个联络地点，地下党的同志们便经常来这里碰头，接受任务，研究工作。华北局城工部的余涤清、崔月犁同志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来我家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见面，了解傅作义的动向。

我们了解到，当时傅作义踌躇万分，犹疑不决，他知道，形势瞬息万变，可能对他越来越不利。他经常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有时顿足，有时咬着火柴棍，心情焦急……他的一举一动，都随时汇报给前线司令部。

做地下工作，吃饭也往往是个问题，有些同志就到我家来吃饭，我们不在，他们也可以叫保姆开饭，有时家里一天要开好几次饭，也分不清是午饭还是晚饭。

保护航空设备

这里也是地下党南系职业青年支部活动的据点。我曾先后担任过这个支部的支委、副书记、书记和总支副书记。中央航

航空公司北平站只有我一个党员，为了解放北平的需要，我在公司发展了几个新党员，一同团结公司职工保护航空设备、电台，动员技术人员留下来工作。为了争取职工的生活保障，阻止设备南撤，我们把中央航空公司的北平站站长看守起来，不让他逃跑，站长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还把中国航空公司、陈纳德运输公司的职工团结起来，接管了设备和资产。我们保持着设备完好、工作正常，每天都有值班人员监听通讯活动。后来，这些设备为两航起义的安全飞行、通讯导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我们职业青年总支部有地下党员 100 多人，分布在本市各行各业，渗透到许多要害部门，做着广泛联系群众的工作。我们通过各种办法收罗了敌人的许多武器，解放后，我们上缴了机关枪、冲锋枪、卡宾枪等长短武器几十件，装了满满一辆三轮车。

军警夜查户口

1948 年底的一天晚上，国民党的军、



1979 年 3 月，李树藩（左 2）访问罗马尼亚民航部门

警、宪、特联合查户口。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叫开了大门，我连忙把手枪藏在腰间。他们走进过道，对着墙上挂着的航空公司的大沿帽和美军的草绿色羊皮里短大衣（街上买的）端详了好一阵，似乎弄不清主人的身份，其中一人详细地盘问了我一番，没有发现什么破绽。然后，他们在客厅、卧室、厨房和院子里转了好一会儿，才怏怏地离开了。直到这时，我悬到嗓子眼儿的一颗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手心里全是冷汗。因为，我一直惦着后院墙根的自来水表井，那里面有一个用砖头压着的大油纸包。那是地下党组织交给我保管的，里面全是准备解放北平时北平军管会接管国民党各机关、团体、工厂的命令，一份一份加盖了叶剑英和军管会的公章，装在信封里。如果被敌人查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迎接胜利会师

日夜警惕、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 年 2 月 4 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北平市委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召开了北平全体地下党员大会，正式公开了地下党员的身份。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基本上是单线联系，许多很熟识、来往密切的朋友，彼此却不知对方的身份。到那里一看，竟有那么多的熟人！大家从“地下”来到“地上”，相聚一堂，好像从朦胧的黎明转到了阳光灿烂的早晨，一切都看得清楚了。礼堂沸腾了，人们紧

□ 人物剪影

紧握手，相互拥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原来你也是（党员）呀！”——无限丰富的内容都包含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之中。

1951年，我们搬家了。70多年过去了，如今，东黄城根62号已不复存在，拆建成漂亮、整洁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了。

2015年，正值全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荣幸地获得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沉甸甸、金灿灿的徽章拿在手里，抗战时期的紧张工作，东黄城根62号的日日夜夜，北平解放前我们地下工作者和敌人的较量，我和我的同学、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像深深的刻痕，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2016年4月

张其锬：行胜于言 自强不息

○文爱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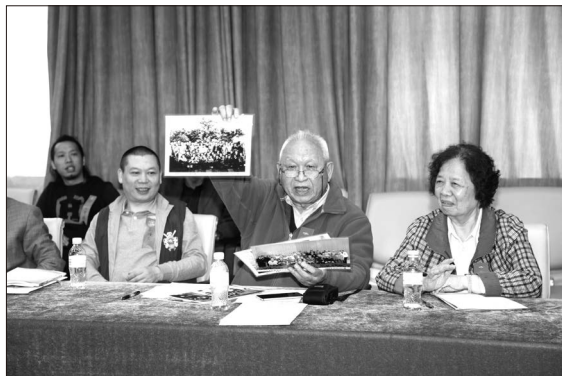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曾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天空中沒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规划专家张其锬走过的每一步，每一程，无不与书籍结“伴”而行。高中时，熟读曹禺的剧作，读英文原版的数理化教材；大学时，参加清华“秘密读书会”；工作中，广泛学习城市规划领域的新知识；“文革”下放农村期间，甚至买了一套农业书籍，钻研农业新科技；

改革开放后，又一头扎进遥感、计算机等新技术的知识海洋中。

与书为伴，甘之如饴。正因有了书籍的滋养，他就像一根不老的常春藤，永远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已88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时刻关注城市规划新动态，熟稔遥感、GIS等新技术，紧跟时代节拍，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的诸多IT新产品，都会玩、会用，难怪周边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现代化老头”。

苦难童年 师恩难忘

张其锬，祖籍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县），清初移民四川，后定居重庆。1928年9月30日他生于四川遂宁，祖辈以经营药材为生。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偌大的中国几乎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很幸运，求学路上遇到了很多好老师。”特别在1941年，张其锬考入重庆树人中学初中二年级。“它是中共地下党沙坪坝区的据点”，学校一



2016年校庆，张其锬学长（中）返校出席校友励学金十周年座谈会，右为贺美英老师